

记忆、欲望与伦理：艾丽丝·门罗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的女性主义解读

Memory, Desire and Ethic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Alice Munro's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王 芳 (Wang Fang)

内容摘要：本文从心理分析学、文学伦理学等角度对门罗的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进行了解读，分析小说集对童年记忆的关注，指出门罗对父权制母性神话和伦理的颠覆，并分析小说中情欲与空间的关系。在思考女性独立的历史进程的时候，门罗一方面充分地利用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一面又为她的人物设置独特的生活情境和伦理现实，把她们安置在与他人尤其是女性的互动关系中，记录她们的选择、对立与分歧，以及可能出现的同情或理解，有着她独特的道德判断。

关键词：门罗；《好女人的爱情》；女性主义；伦理

作者简介：王芳，文学硕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Memory, Desire and Ethic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Alice Munro's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lice Munro'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analysis and literary ethics, analyzes Munro's attention to childhood memory, points out Munro's subversion of patriarchal maternal myth and ethic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oticism and space in this book. In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women's independence, respect to take the doo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feminist thought resources, and the character set for her unique life situation and ethical reality, put them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especially women, record their choices, confrontation and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sympathy or understand, with her unique moral judgment.

Keyword: Alice Munro;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feminism; ethic

Author: Wang Fang, Mast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983004359@qq.com).

一九九八年，艾丽丝·门罗出版了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¹，斩获吉勒文学奖和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进一步奠定了她为当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的地位。《好女人的爱情》共八个短篇，这些小说的核心事件大多发生在 20 世纪 40-70 年代，通过复杂的多层次叙述和有限全知视角把时间跨度拉长，“叙事在几十年间来去变换，把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他们的整个人生都聚集在 20 页的空间里”（Boston 32-33），时间因而成为叙述的重要构成部分，叙述者正是因为拥有时间才获得了洞察一切的智慧，得以审视 20 世纪中期以来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演进中女性的自我追求历程和她们的伦理处境与命运。

一、童年记忆与伊内德的突变

《好女人的爱情》中散落着许多关注人物童年记忆的叙述，比如《孩子们留下》，小说讲述的是身为两个女孩的母亲鲍玲抛夫弃子跟情人私奔而去，尾声部分两个孩子已经成年，“卡特琳对于度假小屋里的夏天隐隐有一点回忆，玛拉什么都不记得了”²（门罗 226）。这些散落在集子里的句子显示出门罗对个体生命的延续性、整体性的关注。过去如何绵延至当下，怎样影响人的选择与命运，无疑是《好女人的爱情》中的一个突出主题。

《好女人的爱情》中的八个故事都有对童年记忆的关注，但是真正写到童年记忆对人的根本性影响的，是标题小说《好女人的爱情》。《好》的叙述以验光师魏伦斯先生死亡之谜驱动：他浸在池塘中的汽车和尸体如何被三个男孩发现，他们又如何在一再拖延后让公众得知。魏伦斯先生被官方确认为意外溺亡，但住家护理员伊内德，魏伦斯先生的邻居，却在自己护理的、身患尿毒症的奎因夫人那里得知另一个版本：因为怀疑二人有染，在魏伦斯先生为她检查视力的时候，她的丈夫、农夫鲁佩特突然闯进来杀死了魏伦斯先生。这段讲述辅以粗鲁的性描写，严丝密合的细节（如地板上的棕色油漆），对伊内德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纯洁、高尚的伊内德在两天两夜没合眼后，构思了浪漫的、自我牺牲的行动计划，在奎因夫人葬礼结束后回到农场，意欲冒着生命危险劝说鲁佩特——伊内德的高中同学，她和女友们主要的捉弄对象，重逢后伊内德对他产生了温柔的情愫——去自首。但当他们并肩站在奎因夫人的病房，看到已经清理过的房间时，突然想起奎因夫人说的“扯谎”，觉得长久呆在那样的房间里——窗户上挂着厚厚的被子遮挡阳光，充满了药味、病体气味，空气停滞，闷热异常——的人，是会产生怪异想象以至于编出惊人的谎言来的。她决定保持沉默，“通过她的沉默，通过她无言的合作，将会绽放出何等的好处啊。为其他人，也为她自己”（73）。

1 为了把短篇小说《好女人的爱情》和小说集《好女人的爱情》区别开来，下文在谈到集子时保留全称，而在谈到单篇作品时，用缩写《好》。

2 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年。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伊内德的突然转变是极其意味深长的,“正是伊内德的突然转变,而不是奎因夫妇可能的勾结,成了这个故事微妙的道德手法的核心行为”(Carrington 159-70),这个“门罗式”的行动,蕴含着精神分析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复杂的内涵,构建了深邃的文本内部空间。促成伊内德突然转变的直接原因是童年记忆。在四、五岁的时候,伊内德有一天去父亲办公室,发现爸爸腿上坐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戴了一顶装饰了无数花朵、带面纱的帽子”,她告诉了母亲:“前面那两个东西里有一个塞在爸爸嘴里”。由于年幼,不知道如何说“乳房”一词,伊内德把它描述成冰淇淋蛋筒:

妈妈于是做了一件非常令人出乎意料的事。她解开裙子,掏出一个肤色灰暗、摊满手掌的东西。“像这样的?”她问。

伊内德说不是。“是像冰激凌蛋筒那样。”她说。

“那你肯定是在做梦咯”,妈妈回答,“有时候人会做一些非常蠢的梦。别告诉爹地这事,这可太蠢了。”(门罗 72)

这个回忆表面上是为奎因夫人说谎寻找合理性,实际上却蕴含着伊内德最初的性意识及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性观念,她的性别认同、价值观念等复杂的信息,为她的突变提供充足的心理学、社会学依据。年幼的伊内德把乳房描述为冰淇淋蛋筒,把性和饮食联系起来,这让人想起弗洛伊德《性学三论》中关于幼儿性欲的口唇期的相关论述,她母亲端出自己的乳房,显然强化了这种联系。目睹这一幕时伊内德四五岁,弗洛伊德认为这个年龄段是儿童性生活达到第一个高峰的时期,与此同时,他们开始表现出另一种活动,即“求知本能或者探索本能”,这个时期的幼儿会对孩子从哪里来感到着迷,会对异性的生殖器感到好奇,“一方面它的活动对应着升华了的征服欲,另一方面,它利用了窥淫癖的能量”(弗洛伊德 56)。这个时期的探索将会对成年后的对象选择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受到抑制则会出现相应的病症。母亲出乎意料的暴露乳房行为和隐含贬斥的、权威的命令显然抑制了伊内德的探索本能,她陷入困惑之中,领悟到了这种“幻想”的不洁,最后归因于自己智力的欠缺。伊内德后来反复回到这种探索上来,但是是以一种看上去十分高尚的方式:住家护理员。她护理过孩子、生孩子的女人、垂死的老人等形形色色的人,但这些身体是全然被动的,无助于她理解人的主体性。

性欲的口唇期尚无明确的性欲对象,是一种自体享乐的欲望,随后的探索又受到了抑制,虽然母亲否认了父亲的背叛,但对父亲的道德疑虑却保留了下来,这解释了伊内德为什么身材丰满,容貌出众,精力充沛、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却 37 岁还从未有过男友。童年的这次窥视产生的影响若隐若现,当奎因夫人问她是否觉得魏伦斯先生是自杀时,“伊内德想起送她一朵玫瑰的魏伦斯先生。他那种半开玩笑的殷勤令她牙齿发酸,就像吃得太甜时的

感觉。”(门罗 48)“吃得太甜”让人想起“冰淇淋甜筒”的比喻,这个带有明显性暗示的句子,指认了魏伦斯先生的性放纵,身为邻居,并且每周在一起打牌,伊内德却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显然已经对他的道德做出了自己的审判。这个细节也暗示了伊内德对性挑逗的敏感与排斥,这显然是她“总与人若即若离”(门罗 39)的真正原因。

童年的这一幕给伊内德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顶装饰了无数花朵、带面纱的帽子。帽子上的花朵让人想起魏伦斯太太,她“抱着一大捆把脸都挡住的花枝”(门罗 21)送给三位发现尸体的男孩,以至于他们难以启齿说出魏伦斯先生的死讯,和伊内德母亲一样,她对丈夫的不忠早已心知肚明,对丈夫夜不归宿处之泰然。它的过度装饰也让人想起小说第一部分中巴德正处在青春期的两个姐姐,她们用五花八门的饰品、化妆品过度装扮自己,把家里弄得又脏又乱。因此,过度装饰的帽子一方面和男权社会中女性被物化的命运相关,一方面以它光鲜的外表掩盖了中产阶级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的真相。

这类用鲜花、蕾丝手套、带面纱的帽子等武装起来的女性,也出现在《变化之前》中。“我”因为没有母亲,童年时期曾经长期躲在灌木丛中偷窥精心打扮、来找父亲“打维他命针”(堕胎)的女性,“为她们的女性魅力倾倒”。成年后“我”拥有了“女性魅力”,和神学院哲学教师罗宾订了婚,但在得知“我”怀孕后,罗宾以前途、道德压力等说辞要求“我”堕胎,甚至不敢亲自去打听堕胎的医生。“我”独自生下孩子,不知道性别就送给了人,回家休养却发现父亲多年来一直偷偷为女性堕胎。刚刚经历过生育之痛的“我”以为可以和父亲谈一谈,却受到父亲粗鲁的斥责,后因父亲的助手 B 夫人胳膊受伤,“我”帮助父亲做了一次堕胎手术,并在此后的某天对父亲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直接导致了父亲中风而死。《变化之前》详细地描写了手术台上的女性的衣着、刮宫过程以及堕胎/生育后女性下半身红肿的伤口,又用嘲讽语气描写了罗宾爬到车下去找“我”扔掉的订婚戒指,“大衣裹着臀部,下摆摊开在地上那样子”(门罗 306),拥有了女性魅力的“我”终于明白了女性魅力下的斑斑血泪,明白了男性道德规范的伪善。

伊内德同样把过度装饰看成是女性气质,但她的个性与童年记忆让她远离、否定女性气质。进入青春期后,在其他女孩都注重外表、耽于罗曼蒂克幻想的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的野心,并在两个目标之间徘徊:传教士以及护理员,前者照顾人的灵魂,后者照顾人的肉体,都有治病救人的意图,带有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她选择了做护理员,在受到父亲阻挠(父亲病逝前要求她发誓放弃护理职业)后却不畏辛劳、折衷成为住家护理员,一做就是 16 年,以不计得失的忘我精神,赢得了周围人的敬重。显然,伊内德以放弃女性的性别特征和个人欲望,进入了公共领域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早期女权主义者谋求的目标,以年龄而论,故事发生的 1951 年,伊内德 37 岁,也表明她是一位受馈于两次世界大战、得以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早期

女权主义者。这一代女性主义者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抑制了女性性属的自然，过于强调男女两性的同一性。伊内德在决定从事护理工作的时候，把父母希望她结婚、过中产阶级优裕生活的愿望当笑话听，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但是奎因夫人勾起了她的童年记忆，让她重新考量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伊内德原来护理过的人完全不同，奎因夫人清醒冷静，没有任何羞耻心、温情与善意，甚至对两个女儿也是如此。她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且不惮对他人做最恶意的猜测，她很可能猜到了伊内德和自己丈夫之间隐秘的情意，故而在临终前分别和两人交谈，设下障碍阻挠他们的幸福。奎因夫人出身底层，在孤儿院长大、曾经做过旅馆女仆，这个职业常常是堕落为妓女的前奏，在讲述自己和魏伦斯先生的关系时，奎因夫人用语恶毒，毫不避讳自己和他做性交易的事实，显示出了对男性的愤怒与蔑视，像极了《第二性》中描绘的妓女对“体面”男人的恨：“难道我们不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种男人会轻易撕去他们斯文、自制和自大的假面具，行为如禽兽一般吗？”（波伏娃 527）。但是，不能把奎因夫人单纯地理解为一个受害者，她毋宁是个强者。鲁佩特·奎因性格腼腆，婚前从未接触过异性，他们的婚姻显然是她为自己争得的一块地盘，而婚后她显然也无意恪守妇道。

这个冷酷无情的女人撕开了中产阶级家庭虚伪的道德面纱，她问起伊内德母亲的大房子是否是 16 个房间，新汽车是什么牌子什么颜色，魏伦斯夫妇关系是否融洽，她嘲笑伊内德的“据我所知”，认为她“啥都不知道”（门罗 34）。奎因夫人的问题，暗示了伊内德母亲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优裕生活所做的交易，让伊内德重估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母亲对伊内德一直爱护有加，在伊内德心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当面临重大选择时，她会听取母亲的意见。在她从事护理工作的十六年内，母亲一直是她的助手，在某种程度上，母亲既是伊内德的伙伴，又是她与世界的中介。母亲的过度保护，让伊内德的世界洁净有序，使得她得以保持一种孩子式的天真，在小说中，伊内德一直对母亲使用儿童式的称谓“妈妈”，门罗用语讲究，称谓的选择绝非随意为之。伊内德在奎因夫人的病房里做的噩梦，实际上是她压抑多年的性能量在冲击她那儿童式的洁净，引导她进入成熟女性的新阶段。在梦中，她与“肥胖扭动的婴儿，裹满绷带的病人，甚至她的亲妈”（门罗 49）交欢或者交欢未遂，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梦中出现的人往往代表着梦者的不同人格，婴儿象征着伊内德不成熟的自我，病人是她在公共领域中身份的投射，而母亲的过度保护，正是导致她过度贞洁的原因，是她必须反叛的权威：如果她嫁给鲁佩特，则违背了对母亲的承诺：“一定不会嫁给某个农夫”（门罗 41），这正是她的噩梦中会出现母亲的原因。

伊内德是标准的好女人，贤德、美丽、和气、聪明。奎因夫人的临终叙述，让她身陷严重的道德考验之中，有论者认为“奎因夫人是伊内德黑暗的镜像。伊内德无法确定自己对于奎因夫人的厌恶之情究竟是奎因夫人的道德败坏与

冷酷无情，还是出于她自身的邪恶欲望”（周怡 151）。¹ 无论如何，正是奎因夫人让她从一个好女人，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从业以来她第一次放任自己的病人孤独地死去，并且在医生到来之前抹除了所有的痕迹。

和鲁佩特并肩站在前厅门口的伊尼德，是一个有了污点的伊尼德，此时的她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妥协，她“抽泣起来。并非出于悲哀，而是因为一种猛烈的、突如其来的宽慰”（门罗 73）。这是一种和解，对世界的不洁，对人本身不洁的接受。但她也终于不再是生活的旁观者，徒劳地看护终将一死的生命，她将投身其中。

二、作为伦理起源的母性

门罗出生于 1931 年，她的盛年时期正值加拿大乃至世界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在这一时代浪潮中，门罗成年、求学、结婚、生育、离婚、再婚，同时开始创作，并最终为自己谋得了独立与声誉。当它以花甲之年开始创作《好女人的爱情》中的故事时，激进时代已经远去，女性的现实生活和面对的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又恰逢新世纪即将来临，此时对自己曾经卷入其中的女性思潮做一个反思，呈现女性独立的艰难进程，显然最合适不过。

巴巴拉·阿内尔在《政治学与女性主义》一书中对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做了梳理，把第二代女性主义称之为连字符女性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女性主义等不同的流派，认为她们“都相信女性的生存条件具有普遍性”，认为“对解决方法的探寻必须始于性别与公共/私人、文化/自然这两种二元论之间的联系”，“第一次以一种持续的、批判的方式，挑战并动摇女性与私人领域的联系”（阿内尔 241）。² 这使得重新定义母性、考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经济处境，关注女性情欲与心理状态，成为那个时期女性主义的突出议题，而这些在《好女人的爱情》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思与呈现。

“无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是道德批评，研究的对象都是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都需要作出道德价值的判断，并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是文学作品自身的要求”（聂珍钊 8-17）。《好女人的爱情》对母性进行了集中的思考，写了各种各样的母亲、以及履行了母亲职责的阿姨、护士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母亲的个性与命运，蕴含着门罗对女性命运与父权制家庭伦理的理解与判断。《好》中伊内德的母亲、《雅加达》中科达尔的母亲、《库特斯岛》中的格里夫人、《唯余收割者》中伊芙的母亲、《孩子们留下》中布莱恩的母亲、《我妈的梦》中乔治的母亲和“我”的姑姑艾尔娜（代理母亲）是传统的母亲，这些女性由于个性、际遇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命运。

1 周怡的著作直接使用英文作品，书中译文是周怡自译，此处引用人名根据译林版做了调整。

2 巴巴拉·阿内尔对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的详细分析见第 240-76 页。

其中伊内德的母亲和伊芙的母亲最符合传统的道德标准，同典型的好母亲，她们和平、友好、活跃，以女儿为荣，没有病态的控制欲。《库特斯岛》中的格里夫人同样是一位传统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她代替了“我”的母亲，对新婚的“我”滔滔不绝地谈论糕点、瓷器、亚麻布和丝巾，以及“照料你男人的方式”（门罗 133）。格里夫人是典型的传统家庭的受害者，她精力充沛，却无所事事，由于格里先生瘫痪在床，她只能被困家中。她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情欲部分地转移到所有物上，“多亏她身边有了天鹅绒、丝绸和瓷器，女人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她的性生活几乎不能给予满足的触觉肉欲得到了满足”（波伏娃 425）。但拥有“某物”只是一种假相，她住着的房子，产权是儿子的，而长大成人的儿子对她所有的关怀都给予拒斥。因此，她的情欲只能演化为病态的偷窥欲，尤其是交往欲望受挫、尊严受到侵犯后，她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成为一个恶意中伤者。因为缺乏独立精神与分寸得当的界限意识，她招致了“我”的丈夫切斯的辱骂。不过这一类母亲并非门罗表现的重点，她们是过去的化身，是新一代女性建设自主选择权力主体、反思的理性主体、以及追求幸福的伦理主体的参照物、起点。

《好女人的爱情》重点刻划的是第二代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新生代母亲，她们大多数在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成家、生育，成为母亲，包括《好》中的奎因夫人、《雅加达》中的卡斯、《库特斯岛》中的“我”、《唯余收割者》中的伊芙、《孩子们留下》中的鲍玲、《富得流油》中的罗斯玛丽、《变化之前》的“我”、《我妈的梦》中的吉尔。这些母亲中有对孩子完全没有感情的奎因夫人，也有觉得有了孩子是“生命中最伟大的变化”（门罗 162）的伊芙；有极端自我、对“公社之家”定期交换性伴侣的实验生活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哺乳只是为了促进宫缩、恢复体型的卡斯，有饱尝母性与自我分裂痛苦的鲍玲——在私奔之后，她在漫长的人生中感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只能劝自己“忍下去，习惯它，直到它成为一段令她悲哀的过去，而不是任何可能的现实”（门罗 226），也有混乱不堪，只是受时代浪潮影响而被拖进了激进生活中、导致自己的女儿被大面积烧伤的罗斯玛丽；有《变化之前》迫于男权文化伪善的道德压力、孩子生下来就送人的“我”，也有《库特斯岛》中为了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压抑了自己的情欲、数年来做着怪异春梦的“我”。

集中体现了门罗对母性本质思考的是《我妈的梦》。孤儿院长大的吉尔是一位颇有艺术天份的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音乐学院，随后懵懵懂懂地成了空军飞行员乔治的妻子并很快成为烈士遗孀。她将音乐“视为人生的责任”（门罗 345），“即使我在她肚子里翻筋斗，她仍旧做了公开演奏”（门罗 324）。事实上整个孕期她都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怀孕让她感觉多有不便，她暗自期待着孩子生下后，又可以和从前一样全身心投入小提琴练习、演奏之中。但孩子生下后她反而需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为了恢复体型紧紧缠住胸腹的裹巾让她浑身疼痛，由于婴儿拒绝母乳，她不得不忍痛断乳，

除了生物性带给她的挫折，她精神追求的那一面也因孩子而被迫中断：她拿出小提琴刚刚打算练习，婴儿就发出难以置信的惨叫、号哭，倾泻“愤怒之洪”，“超过了我之前发出过的任何响声”（门罗 344）。

与吉尔难以适应母亲的新身份不同，吉尔的小姑子艾尔娜在照顾婴儿方面有独特的禀赋。艾尔娜是个胆怯敏感，有神经质倾向的老姑娘，因为承受不了学校的压力，她中途从护理学校退学，在家中照料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母亲，并在一间糕点店工作谋生。艾尔娜“这辈子就从来无法对任何人表现出什么权威”（门罗 330），在人前，“她双手总抖个不停，连给人端茶都做不到”（门罗 337）。这时，吉尔生下了“我”，婴儿的依赖让她荣光焕发，“能够直视所有人的眼睛了”（门罗 342）。艾尔娜接过了全部照看婴儿的职责，但在婴儿 6 周左右时，艾尔娜姐妹俩要带着母亲去对圭尔夫市的表亲做年度拜访，照顾婴儿的职责不得不落在了吉尔的身上。于是吉尔母女长达一天的战争开始了：除了极其疲倦后的小憩，婴儿整天都在哭号，吉尔头痛欲裂，在服用治疗痛经的强力镇痛药缓解头痛的同时，她刮了一点放在孩子的奶瓶里，哭闹了一整天的婴儿进入了昏睡。出访归来的艾尔娜以为婴儿已经死亡，受到刺激，陷入歇斯底里，把“死婴”藏在了沙发下，在一片混乱之中，吉尔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救出了气息微弱的婴儿。经此一难，“我”接受了拉小提琴的吉尔，吉尔也接受了“我”，在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吉尔带着“我”离开夫家自立，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谋生、再婚。吉尔和艾尔娜——一个经历了孕产期却无法爱孩子，一个没有经过孕产期却对孩子爱护有加——的对比，充分说明了生物决定论的荒谬，母性并非什么本能、天性，“母亲身份是获得性的，首先通过一种强烈的生理和心理过程——怀孕与生孩子，然后通过哺育孩子技能的学习、了解”（里奇 2）。

在婴儿奶粉中下药，暴露了吉尔心灵中的黑暗力量。作为一个个性独立的女性，她被生物性裹挟着成为母亲，但内心深处却并没有接受这种创造的“神圣”，她对孩子产生了敌意，因为“孩子……威胁了她的肉体，她的自由，她的整个自我”（波伏娃 477）。但门罗谨慎地保持着与激进女性主义的距离，她的人物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方向，这种自我救赎的努力，完好地呈现在小说开篇的梦境之中。小说以吉尔服用镇痛药陷入昏睡后的梦境开篇，在这个典型的抑郁症患者的梦境中，一场大雪覆盖了夏天的花园，万籁俱寂，吉尔呆在一所“高大宽敞的房子里，四周围绕着中规中矩的树木和花园”，突然想起她很久以前丢弃的一个娃娃，她感到愧疚并最终找到了孩子。叙述者说梦中的情境“像《哦，伯利恒小镇》里描述的情景”，这个典故暗示了吉尔的救赎与孩子的关联。梦境在小说结束部分被艾尔娜的尖叫惊扰，衔接着现实中母女的和解，叙述者总结说：

对我而言，似乎只有在那时，我才变成了女性。我知道这事在我出

生之前很久就注定了，所有其他人在我生命刚开始时就对它一清二楚，可我相信只有在我决定醒来，在我放弃与妈妈的抗争（想必是场不逼得她全面投降就不会罢休的抗争）的那一刻，以及我事实上选择了生存而非胜利（所谓胜利也就是死去）的那一刻，我才拥有了我的女性身份。

在某种意义上，吉尔也因此获得了她的女性身份。她清醒了，感天谢地地，想都不敢想她刚刚逃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她开始爱我了，因为如果不爱的话，就意味着灭顶之灾啊。（门罗 364）

这段总结把女性身份认同的时间点追溯到母亲和孩子相互适应的那个时刻，吉尔头上悬着的“杀婴罪”利剑，把这一时刻置于父权制的律法之下，明确指认性别是文化的而非生物的。女性顽强的生存意志，就体现在她们妥协的姿态上，体现在她们对不完满生活的接受上。

《我妈的梦》叙述视角十分独特，叙述者“我”是那个曾经被认为已经死去的婴儿，在讲述自己出生前以及具有语言能力之前的这段历史时，却带有全知全能的色彩，叙述者的年龄是一个谜，这让故事的合法性颇为可疑。有论者认为，“正是从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开始讲述，门罗才能重现（性别）主题的诞生，以及人类亲缘关系（伦理）的起源”（Morgenstern 69-97），这个说法是富于洞见的。

三、深不可测的家宅

渴望生活常等同于渴望性，是《好女人的爱情》中众多女性的特点，八个故事都直接或含蓄地写到了女性对性满足的需要——《我妈的梦》中的尚茨夫人嫁给了儿子的同学、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的尚茨医生，过着奢侈的放逐生活，可谓是渴望生活的最佳注解，和她年龄相近的伊芙，在搭车女孩伸手摸她的大腿时，也“成功地撩拨起了几根老迈的神经”（门罗 181），“大有可能她是依旧，而且一如既往地，渴望着爱情”（门罗 182）。

如果说《好女人的爱情》中童年记忆多以现实手法通过空间重叠或者时间绵延来呈现的话，女性的性唤醒/压抑，则多借助梦境与互文来呈现。伊内德的情欲多年来一直处在沉睡状态，但当她置身于鲁佩特·奎因家中时情欲却猛烈地爆发了。门罗以互文手法，通过植入格林童话《睡美人》来呈现伊内德的性唤醒。鲁佩特·奎因的家和童话中的皇宫一样隐秘：“大路上看不见他们家院子，这一点很幸运。外面只能看到屋顶尖儿和楼上的窗子”（门罗 57），进入他家的路上，“浆果树沿着小巷生长，长得越过路面”（门罗 53），通往河边的路是长满藤蔓、杂草。“美丽、贤慧、和气、聪明”（格林兄弟 150）的伊内德是沉睡的公主，沉入可怕的梦境，手持利斧在前面开路的鲁佩特则是童话中的王子。《库特斯岛》中的“我”和切斯积极进取，谋求世俗的成功，生活逐渐富裕，但这种富裕却以性压抑为代价，多年来我一

直在梦中和格里先生交媾，“从这些粗野的梦中惊醒，心头一片空白，连一丝惊讶和羞耻都没有，旋即又睡着，早上带着一种我习惯要否认的记忆醒来”（门罗 149）。《雅加达》引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劳伦斯的小说，药剂师肯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海湾》中的斯坦利一样一本正经，他的妻子卡斯在舞会上和陌生男人互相挑逗的热舞，和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中戈珍在牛群前的舞蹈相似，充满着狂热奔放的欲望。鲍玲与杰弗里的婚外情是在排练法国戏剧家让·阿努伊的剧本《欧律狄克》的过程中发生的，她在情欲与母性之间的挣扎则呼应着《安娜·卡列尼娜》。

鲁思·斯科尔认为门罗所有小说的核心都是“对动物性欲非理性的大胆承认”（Scurr 4 Oct. 2011），这种说法其实大谬不然。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引入人物不堪的春梦，还是以互文的手法呈现人物的性压抑/觉醒，性在门罗这里，首先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这一点在《库特斯岛》中表现得成为突出。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我”1953年新婚时租住在格里先生家地下室的一段经历，结束于已经取得了富裕物质生活的“我”被压抑的性能量被消耗殆尽的老年，格里先生的剪报故事——一个男人在家宅中被火烧死，年仅7岁的儿子在离家一英里森林里被发现，其妻在事故前已经离家出走——发生在1923年，蕴含着三代女性的情欲与父权制家庭的关系。格里先生既作为简报故事中受伤自闭的孩子，又作为“一个遗迹”，拖着“废弃的失事船只般的躯体”，成为传统父权家庭中未得满足的女性情欲的见证：为了“最最辉煌、前所未有的房子”（门罗 146），“我”多年来时不时地在梦中和格里先生交媾，发泄压抑的性能量，“我”的怪诞春梦和格里夫人的偷窃癖、妄想狂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谋求物质生活的女性被压抑的性本能的曲折宣泄。当然，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具有反思的理性，意识到这一切是男女共谋、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我没有受害者的愤怒，“掉在那位丈夫尸体上的焦黑房梁，我倒从不曾看到”（门罗 149）。

《库特斯岛》通过文明导致的性压抑揭示人类的世代更替，循环往复，当显然已经不年轻的叙述者把自己的婚姻描述为“为了欲望，我们做了这笔交易……我们从没想过老一辈人……也会做这种交易”（门罗 127）的时候，对她年轻时极端厌恶的格里夫人，应该多少有了一点理解。这一点迟到的理解甚至歉意在《唯余收割者》中表现得更明显。“你最恨你妈什么？”伊芙在成为外祖母、开车带着外甥走在乡村公路上时，想起了年轻时常玩的这个游戏，“感觉就像咬到一枚痛牙”（门罗 169）。和那些女孩厌恶母亲“紧身胸衣”、“湿漉漉的围裙”、“引用《圣经》的话”不同，伊芙厌恶母亲的鸡眼，这是对青春对衰老的厌恶。伊芙是个没有名气的小演员，年轻时曾纵情地投身性解放运动，过着自由放纵的生活，女儿就是她在火车上发生一夜情而生下的。当年轻的她揣着饱满的情欲奔向自由的时候，并没有想过人也不过是自然物，逃不掉生老病死，正如现在女儿索菲也毫不顾念地扔下她，只想和

丈夫在一起一样。在女儿来度假的这几天，伊芙小心翼翼，却仍然留不住女儿的心。在女儿去机场接丈夫的期间，她驱车去还录相带，想起了童年时期母亲带自己在乡村的漫游，在回忆的引导下误入一幢混乱的私宅。相比“体态丰满、娴静古典”（门罗 163）的女儿，她在这宅子里遇到后来让她搭车离开的女孩更像她的青年时代：吸毒、滥交，人生毫无规划。

正如《库特斯岛》中“我”“最最辉煌、前所未有的房子”建立于地下室的基础之上，《好女人的爱情》中的家宅，都隐含着暴力的阴影：《好》中的农场是凶杀第一现场，《变化之前》中父亲的房子，肮脏、混乱，周期性地杀婴，《富得流油》中德里克妻子的祖传家宅烧着了卡琳，努力适应母亲和情人夫妇的三人行现实的孤独女孩。隐含着罪恶与血腥的父权制家宅已经没落，正如伊芙寻找的有镶嵌画的古老房屋已经坍塌，然而人类对家宅的渴望是永恒的，流动的寓所对应的是不负责任的母亲和受伤的孩子。卡斯喜欢租住的“伟大的小破屋”的浪漫情调，无意和丈夫一起购置房产，最终抛夫别女，几十年后，她的女儿诺埃勒正要离开第二任丈夫。住房车的罗斯玛丽目睹了亲生女儿在情夫妻子家宅里被烧成一团火。和情人度过了纵欲狂欢的一夜后，鲍玲在汽车旅馆醒来，意识到她与丈夫布莱恩的那套小屋，“那幢可谓表达了她与布莱恩的生活，表达了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房子的关系也断绝了”（门罗 219）。伊芙始终没能为女儿提供一幢可供回忆的家宅，当她和女儿兴致勃勃地想象着装修出租屋时，已经埋下了女儿离开她的伏笔：索菲婚后购置了一幢私宅，显然，那才是家的感觉。

女性欲望与空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揭示出门罗内心存在的地形图，这其中显然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私人领域的影响，但是却保持着谨慎的距离。鲍玲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们并不恨她……她们也不原谅她”（门罗 226）。“或许她这代女孩都觉得，每个人理所当然都有一段充满各种故人，无法说清的过去吧”（门罗 88），全知叙述者的这些评价，显示出了女性反思主体的生成。

《好女人的爱情》中有很多细节取自门罗自己的生平与经历，“门罗的虚构故事往往与真实的现实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使得现实呈现出复义性”（周怡 151）。¹正如聂珍钊所说：“文学家的责任通过作品表现，而批评家的责任则通过对作品的批评表现。因此，今天的文学批评不能背离社会公认的基本伦理法则，不能破坏大家遵从的道德风尚，更不能滥用未来的道德假设为今天违背道德法则的文学辩护”（聂珍钊 7-17）。虽然写作《好女人的爱情》

1 周怡主编《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以介绍、赏析为主，内有一篇《好女人的爱情》的评论，对这个短篇中与门罗生平有关的时间点做了介绍，比如故事发生的 1951 年是门罗发表处女作与结婚的年份，奎因夫人的死亡日期是门罗的生日。附录部分有门罗生平，和《好女人的爱情》的八个短篇中涉及的时间对照，可以发现它和门罗生活的高度对应关系。

中的故事时，门罗已经六十多岁，已经做了外祖母，激进的浪潮早已退去，但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在一定伦理道德法则中呈现着人和事，我们还原语境通过批评深入探索它，在全球化的今天回望，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些前行的智慧与力量？也许，这正是门罗讲述这些故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Works Cited

- 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性主义》，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
[Arneil, Barbara. *Politics & Feminism*. Trans. Guo Xiajuan.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5.]
-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
[Beauvoir, Simone de. *Le Deuxième sexe*. Trans. Tao Tiezhu. Beijing: China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Boston, Anne. "Hidden Reasons." *New Statesmen and Society*, Vol. 3, No. 1233 (October 19, 1990): 32-33.
- Carrington, Ildikó de Papp. "Don't Tell (on) Daddy": Narrative Complexity in Alice Munro's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34 (Spring 1997): 159-70.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赵蕾、宋景堂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Freud, Sigmund.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Trans. Zhao Lei & Song Jingtang.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 格林兄弟：《格林童话》，魏以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Brothers Grimm. *Grimm's Fairy Tales*. Trans. Wei yix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 Morgenstern, Naomi. "The Baby or the Violin? Ethics and Femininity in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 14.2 (2003): 69-97.
- 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殷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Munro, Alice.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Trans. Yin Gao.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 (2006): 7-17。
[Nie Zhenzhao.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oral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6): 7-17.]
- 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毛路、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Rich, Adrienne. *Of Wome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convention*. Trans. Mao Lu, Mao Yuyuan,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8.]
- Scurr, Ruth. "The Darkness of Alice Munro." *Rev. of New Selected Stories*, by Alice Munro.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 Oct. 2011. Web. 5 Oct. 2015.
- 周怡主编：《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
[Zhou Yi, ed. *Understanding Alice Munro*. Flower City Press, 2014.]